

辛亥革命回忆

朱 德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 1840 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达 109 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多次说过的，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 109 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前 80 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 1949 年为止的后 30 年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的中国人，是亲自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这两个时期的，并且接着又亲自经历了从 1949 年以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

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这次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谓“中华民国”很快就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代替清朝封建统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辛亥革命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而发生的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辛亥革命的公认的领袖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19 世纪末，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间，出现了两个派别，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1898 年“戊戌政变”的失败，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的维新派破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05 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统治来“建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们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组织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我当时上学的云南省来说，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达到昆明并且掠夺了 7 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掠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

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1907年，云南同盟会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 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 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不幸失败。接着同盟会会员杨秋帆等又在永昌举行起义，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的影响却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云南讲武堂，原来是1909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才办起来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第十九镇的随营学堂也并入了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 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足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那时，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100人提前毕业，其中有18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就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我

当时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标统是罗佩金，管带是刘存厚。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0月30日(旧历九月九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团)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11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9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蔡锷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像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团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团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

门的骑兵团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12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署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署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做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署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最后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库，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也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11月1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

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即布置向革命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就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8个营入川。旧历十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仍在援川军中担任左队队官（连长）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有钱发饷。当时，就连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锷更不例外，那时他

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 60 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个招牌扔掉了。

在这以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以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

1915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接着又于同年12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钧，参谋长是何国钧，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以后与第一军会师武汉。第一军共有3个梯团，6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司令，随护国军进入四川。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6000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

由于蔡锷将军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

继袁世凯而起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于 1917 年号召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这时云南、四川的队伍，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但是由于唐继尧等人排斥孙中山先生和进行分裂活动，以致护法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又因为唐继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地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最根本的失败原因，则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为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很明显，要战胜帝国主义，就非深刻地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革命斗争不可。这样的领导责任，是资产阶级所决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个领导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又说：“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

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作的一个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当时担任云南军队的旅长驻防在四川。如同前面所说，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到了 1921 年滇军回滇时，我就在这年的 8 月离开了军队；第二年，罗佩金被唐继尧杀害，我就从四川到了上海，准备到俄国或者德国去学习。就在上海，我会见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不久，我就动身到德国去了。我在德国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并且这时又在党的指示下重新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活动。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也吸取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勇敢地走上了同共产党、同工农、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的道路。孙中山先生真不愧为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许多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人们，采取了同共产党和人民合作的正确立场，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人民的可贵的朋友。

辛亥革命英雄们的事业，已经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完成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新中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道进行保卫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让我们用新的胜利，来纪念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们吧！

（1961年）

我的回忆

何 香 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宝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

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 1902 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 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 1903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会面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看他，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轻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

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 广为结交。此后 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 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才。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 20 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 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 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

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

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返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有始有终 如或渝此 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受，交给孙先生。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

部 从此革命风潮 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 这很好 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 睡了又醒 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 3 时以后 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 是早有原因的。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料，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 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

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